

劉伯驥著

中西文化交通小史

正中書局印行

中西文化交通小史

劉伯驥 著

正中書局印行

自序

此書之撰著，豈敢以稽古考據自承哉？不外蒐集史材，摭摭遺言，旁證衍引，間附鄙見，聊作有系統之編述而已。著者因專攻「中國六藝與西洋七種通藝之比較」之便，從而旁溯中古時代之交通，東西文化之交流，彙集筭記，積篋盈案，遂稍加整理，裒成一帙，意者付諸梨棗，亦足供學人士子參考之資也歟。際茲大陸沉淪，中華文物，摧殘蹂躪，不絕如縷，著者寄身新大陸富強之邦，迴念我大唐昔日聲教之隆，千載後不唯不繼往開來，發揚蹈厲，忍令秦灰浩劫，復覩今日，曷勝感喟！雖然，中國文化嘉惠於西方者固大，而以隋唐當年國勢之強，遠受西方文化之影響亦不尠。夫中古時代東西文化之交流，各採所需，純乎自然，無須假文化合作之美名，而思想學藝之灌輸，已獲互惠之實矣。然則是書之作，對世界文化史觀似不無裨助也哉。惟著者棲遲海外，凡十餘年，終以陋於環境，圖籍有限，對史材所能用力之處，亦不過蠡索故事，推句敲辭，疏虞簡失，殆不免貽笑士林。顧敷陳皆屬史實，務存樸質；敘述不憑空臆，寧絀放言。邦人君子，不嫌謏陋而辱教之，匡正其繆失，使中繩墨，抑又幸矣。是爲序。

劉伯驥序於美國加省舊金山 中華民國四十年九月

目次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二章	西方對中國之認識及六朝間交通往來	九
第一節	西方學者對中國之認識	九
第二節	六朝與西方之交通	一三
第三節	北魏朝之胡人東來	一七
第三章	隋唐間交通發展與文化接觸	二五
第一節	隋代之經略西域	二五
第二節	唐代與西域交通之發展	二七
第三節	中國與印度之關係	三一
第四節	中國與阿拉伯之關係	三五
第五節	突厥與波斯	三八
第六節	西域之貢物	四〇
第七節	唐代和親政策	四三
第四章	東西移民生活	五五
第一節	中國人流寓西域	五五
第二節	唐代對外僑之管理	五六

第三節	胡客之生活	五八
第四節	胡人之華化	六一
第五節	商胡之沿海聚居地	七六
第五章	西方文化對中國之影響	八五
第一節	天文	八五
第二節	數學	八八
第三節	因明學	八九
第四節	醫藥	九一
第五節	語言	九九
第六節	樂舞	一〇一
第七節	娛樂遊戲	一〇七
第八節	美術	一一〇
第九節	工業	一二二
第十節	寶石服飾	一四
第十一節	動植物	一五
第六章	西方五派宗教傳佈中國	三五
第一節	佛教	三五
第二節	景教	一五〇

第三節	摩尼教	一五六
第四節	回教	一五九
第五節	祆教	一六一
第七章	中國文化之傳播西方	一七一
第一節	蠶絲	一七一
第二節	造紙術	一七九
第三節	印刷術	一八〇
第四節	植物與草藥	一八一
第五節	娛樂	一八三
第六節	鑄鐵與鑿井	一八三
第七節	工藝	一八四

第一章 緒言

古代中西文化之溝通，在綿延數千年中，其起源與演變，誠不易稽考；管窺蠡測，所得者不過鱗爪而已。惟參究史料，論其顯著事迹，略可分爲四個時期：（一）張騫班超之出使西域；（二）南北朝隋唐之與西方增進關係；（三）元兵之西征；（四）明末教士之東來。然此僅在近代史以前，舉其犖犖大者。在此四大時期中，尤以隋唐間一階段爲最重要，事迹至繁雜。是時也，中國與西方接觸頻仍，如通商貿易，使節朝貢，教士往來與夫中國經略西域，用兵邊疆，在在均爲中西文化發生接觸之介媒，使中西文化有傳播交流之機會，乃至摹仿吸收，而壯大中國隋唐間之文化。因此大唐聲教，卓邁前古，又豈偶然哉？

中國文化史上，論者嘗以春秋戰國爲學術思想之黃金時代，而可等於西方之希臘，然則隋唐之世，似可比諸羅馬。夫羅馬之文化，一面接承希臘之傳統，一面則因被蠻族侵入及其擴展領土之結果，而吸收四鄰民族之文化，使羅馬帝國創造其自有類型之文化產物。紀元前後六七百年間，前則繼承希臘文化之遺產，後則直接間接孕育基督教文化之發展，爲西方文化體系三大基礎之一。中國之李唐盛世，正值羅馬已告衰落而進入所謂黑暗時期之際，其當年雄風，誠足與羅馬相媲美。帝國政制之大統一，文教之發揚，生活之豪華，國威領土之擴展，對外用兵之頻仍，使節之往來，通商之暢達，文學藝術之裔皇，則唐代貞觀、開元、天寶之際，與羅馬奧加斯都帝國時期，真形迹肖類。由羅馬而產生東羅馬之另一文化體系，則又與由隋唐間之影響日本奈良、平安兩朝之文化相似也。雖然，從本質上言，羅馬文化乃一種非理想性，而爲具體性，實用性、與建設性之文化，換言之，即面對現實，此時此地之文化也。如謂希

臘文化爲近代西方文明之母，則羅馬時期，誠爲一種承上轉下之傳播階段。希臘文化，乃西方古代文化、東方文化、及埃及文化之第一次大綜合。羅馬文化，則又爲羅馬本土文化、希臘文化、東方文化、及各蠻族文化之第二次大綜合。基督教文化，則爲東方文化、希臘羅馬文化、與西歐各國本土文化之第三次大綜合。而以希臘之哲學、羅馬之法制、基督教之宗教生活，構成西方文化體系之鞏固基礎。中國隋唐文化，何莫不然，蓋上溯西周、春秋、戰國時代之思想哲學，秦漢大統一之法制及社會組織，魏晉以來變態社會生活，與朔方民族及西域各國文化而作一次大綜合。此一次文化上大綜合，乃奠定中國文化更爲豐厚之基礎。論其兌變之史迹，亦與羅馬無異焉。

綜上所言，中國文化，由後漢至隋唐亘七百年間，乃一大變化時期。由於經過此種變化，中國文化生活，領域較爲廣泛，內容更爲豐富。蓋吸收外來文化之各種新因素，其範圍包括亞洲之全部，其時間綿延歷六七百年之久，至是大告成熟，蔚爲具有活力之唐代社會，擬成空前未有之大統一，爲五千年歷史中之脊膂，孕育以後千年來之民族性格。故論唐代之學術，舉凡法制、政治、經濟、藝術、歷史、地理、文學、歷算、醫藥、宗教之創作與著述，均較前代璀璨而豐腴，且以嶄新之姿態出之。無他，此乃經七百年間中西文化接觸後所獲之成果。蓋自東西交通發展以後，中國人之眼界，曩昔僅限於五岳四瀆之間，一躍而透望至蔥嶺以西，地中海以東，印度洋以北之廣袤區域，各種學藝、技術、與思想傳入後，經觀摩比較，思想上大受影響。於是唐人之氣魄一變前代之拘謹樸質，而具有磅礴雄偉之象。史家嘗稱美春秋戰國爲中國學術上之黃金時代，誠然，但此僅從思想之創作性而言耳。至若從整個學術文化體系言，則隋唐之際，已劃入一新階段，其內容之壯大與豐富，又非前代所能及。假使由後漢至隋唐六七百年間，中國依然閉關自守，與西域未開交通，中國文化尙未受西方之影響，則其本質當然保全純中國

型之文化，若與隋唐間文化相比，自不免較爲簡樸，尤其缺乏外來新穎思想之刺激，其本身發展，亦必流於固陋與遲滯。雖然，春秋戰國雖號爲中國學術上之黃金時代，但在春秋戰國之際，或西周以前之時期，黃河流域之文化，何莫非吸收附近蠻、夷、戎、狄文化之因素。尙書堯典、舜典、禹貢等篇，語及蠻夷與貢物，即爲此意之說明。所謂「聲教訖於四海」者，應釋作中華文化既達於四夷，另一面四夷之文化，又相繼傳入中國者也。當時所謂「先王之道」，似指中國固有文化之傳統而言，但在春秋戰國之際，「非先王之道」者，不知凡幾。齊東野人之言，已不列入中國文化之體系；荊楚思想，更斥爲缺舌南蠻，則所謂「非先王之道」者，當認爲外來之文化，自無疑義。然此對春秋戰國時代之文化本質，却能使其融會協調，而發生光芒。隋唐間文化之發展，不過爲文化上較大綜合之結果，則其內容自然愈益豐富，光芒更爲豪放者矣。

雖然，吾持此說，並非中國文化歷如此長期受外來文化之影響，已完全變質之謂，反之，正以見中國文化最特色者，乃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充實其內容，增強其本體者也。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未有能孤立發展者。換言之，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化體系，乃凝集無數外來文化因素所構成。惟對外來文化之能否吸收，端在此文化本位受外來文化接觸與刺激後之反應程度如何而定。彼落後之民族，因其文化程度太低，即使有外來文化之傳入，每不易了解與吸收，故無法引起其強烈之摹仿興趣。基此原則，對外來文化之吸收云者，必其本身之文化體系自成一單位，——即其本身已成一文化本位，至少其文化生活方式已形成存在性，傳入外來文化，方觸引其求知慾，而思所以分別運用之者。因此對外來文化傳入後之反應，每表現於兩種程度：（一）同化；（二）吸收。同化者，對外來文化無條件接納，將自己固有之文化拋棄或放在次要之地位，而以外來文化裝進爲自己文化生活之本體，此所謂征服是也。吸收者，乃

在平等上有條件之採納，即棄短取長——引人之長以輔己之不足是也，此仍以根據自己之需要而定。孟子所謂：「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此語較文化本位觀似尤頑強，在中國現時或譏為狂妄，但世界列強在文化上何曾不引此為自負之張本。要言之，同化者反客為主，謂之被動；吸收者主客分明，謂之自動也。世界各大文化體系，其發展與壯長過程，均由對外來文化之吸收，而非同化。中國文化體系之偉大性，——至少在文化史上看出其偉大，貴在其能對外來文化之吸收；從另一角度看，中國文化歷數千年之綿延發展，雖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但中國文化本位，依然存在。以中世紀佛教之盛行，西域各國，受其影響者，多變為印度化，獨傳入中國後，不惟不印度化，却光飾中國之思想，增強中國之哲學，使中國人之人生觀，開一新境界。其他各學藝，亦復如是。穀梁傳所謂來中國，外來文化傳入中國後，即成中國化。中國文化之偉大性，即在此點。

唐比教授(Prof Arnold J. Toynbee)將中國文化，從本質上劃分為兩階段，春秋戰國時代為一階段，南北朝以後又為一階段。前者謂之中國文化(Sinic Civilization)，後者謂之遠東文化(Far Eastern Civilization)。所持觀點，似覺未當。何則？唐比教授之劃分法，認為中國文化，自南北朝以後，以受外來文化之影響，而非單純保持中國固有文化之真面目，但此正其所犯主觀上之錯誤。中國受外來文化之影響，在南北朝以前已有之，即使遼溯春秋、戰國、或西周時代，其事例可指出者甚多；而在南北朝以後，隋、唐、宋、元、明、清各代，亦不斷受外來文化之影響，事迹更為昭彰，端不能率爾見南北朝以後文化影響之史例略著，就以為中國文化完全變質者也。唐比教授尚有忽略者，即其對中國文化觀，始終以渭水流域文化型為代表中國文化之整體，而未能認識自西周以後，黃河下游之人口增加，後漢時渭水流域人口急激減少，山東人口亦有減少之傾向，而漸向長江流域移動，故豫南湖北人口增加

，江蘇亦有增加之傾向，湖南江西則急激繁殖。因此文化發展，每隨人口發展之地理而不同。唐比教授更忽略春秋戰國時代之文化，乃夏、商、周三種略有不同之文化一大綜合。故中國文化，一方面固然自始即不斷受外來文化之影響而壯大，實不限於南北朝時代爲然，另一方面，中國文化正如西方及印度之文化，自始即保持其整體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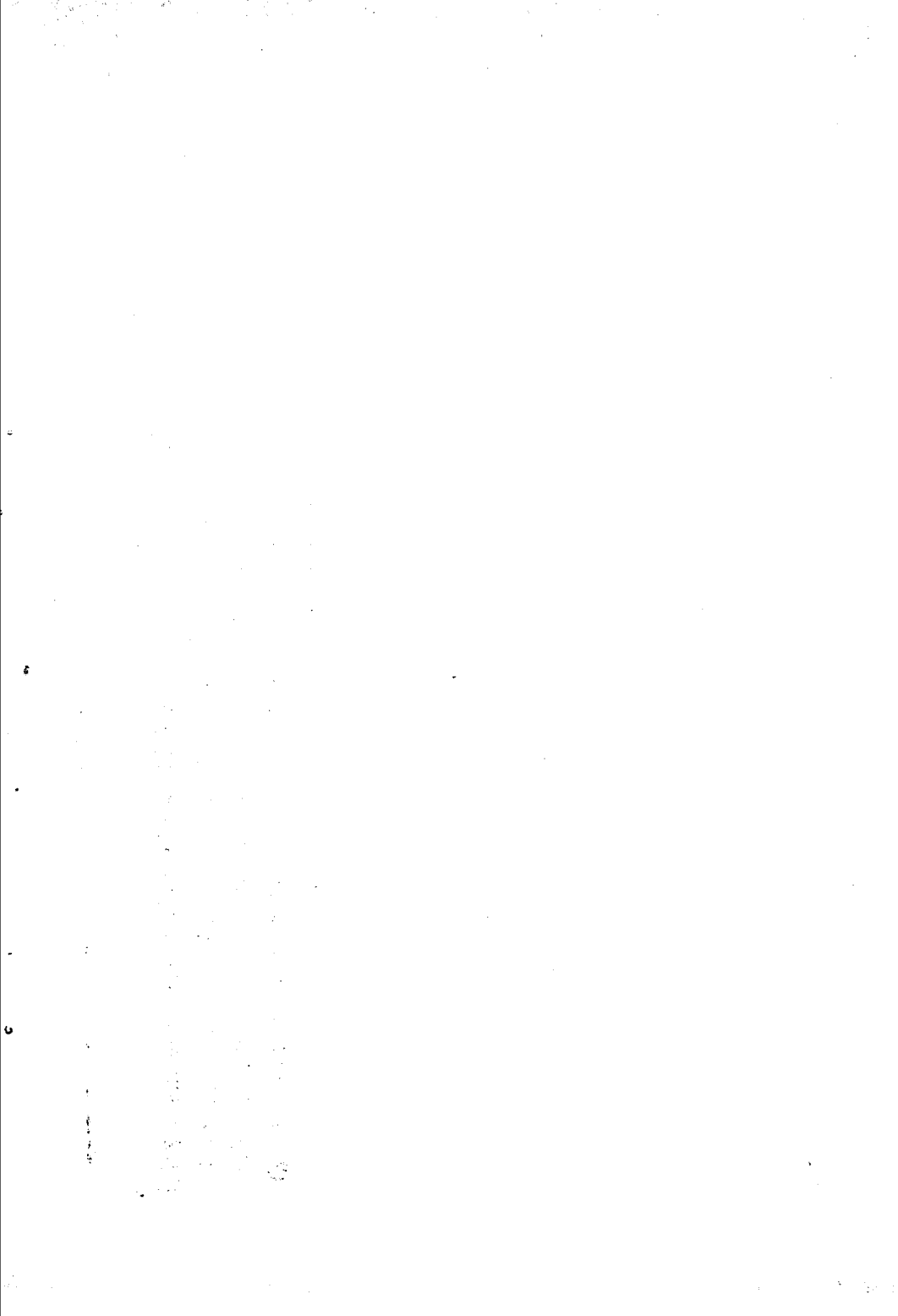
凡具有悠久歷史性之文化體系——如唐比教授所舉之西方、遠東、伊斯蘭、印度、及正教派等現存之五大文化主流，既不能抹煞其時間上之歷史傳統，更不能離卻其空間上現實生活方式之所需要。此兩大條件，乃決定一種大文化體系本身之存在。文化上之交流與吸收，正如植物之靠空氣與溫度，方能增益其滋養，涵煦其生機。但此觀點，與「文化優越論」及「全盤西化論」，完全不同，茲兩者對於文化所佔之地位與所賦予之作用，均犯偏輕偏重之弊。「全盤西化論」者，實忽視文化壯長之歷史性，而發此矜時之論。其最有力對照，厥惟第八九世紀之際，阿拉伯人之摹仿希臘與印度，尤其對於希臘之學藝，舉凡天文、數學、幾何、醫學、論理、哲學、與音樂等，廣爲翻譯，從事揣摩。甚至第十世紀與第十二世紀間，阿拉伯文化傳播西歐時，儼然爲希臘學藝之權威。然阿拉伯到底不脫伊斯蘭文化之本色。希臘與印度之學藝，不過藉以助長其本身文化之發展，亦決不能視之爲全盤希臘化或印度化者也。然此僅舉其一例耳。譬諸今日，彼欣慕西方文化之燦爛，應追溯其三千年來，由希臘、羅馬、中世紀以迄現代之文化主流遞嬗變革過程中種種基本因素，歷長期努力所產生之必然結果。若僅羨其成果纍纍，就以爲頃刻間即可移植於中土。不思耕耘，僅望收穫，此正爲「全盤西化論」者所犯之謬誤見解。中國文化，應否認其純粹爲中國本土之產物，中國如是，各國亦然。「文化優越論」者，實犯偏於主觀上狹隘之想法。現代野心國家，嘗以主義一詞，爲其侵略鄰邦之幌子，皆由此種謬誤見解從中作祟。中國文化之特徵，原愛

好和平。中世紀之際，中國人對於自己之文化雖不免有優越感，但對文化之交流，率由自然，而從未假暴力相壓來傳播其文化者，反之，中國人對外國文化之傳入，更表示歡迎，用能使西方文化跨越帕米爾高原以後，灌輸中國文化上新血液，不惟無礙於中國文化之發展，且以壯大中國文化之本體者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學者，曾倡國際合作，以弭息戰爭，於是政治諒解及文化合作之說，甚囂塵上，蔚為短期間之風氣。夫文化合作，無論有意與無意，蓋有史以來，人類行之久矣。中國歷史上對於外來文化之態度與政策，尤其南北朝與隋唐間之史實，足為國際上一大榜樣。試看自東漢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中國與中亞細亞各國及印度之間，發生國際關係，千里求經求佛骨，進香膜拜之徒，以喜馬拉雅山之峻險，不能阻止其虔誠追慕之心，和平之氣息，充塞於亞洲。此偉大之成就，試問世界史上，有何階段何制度可相比擬？假使世界列強摒棄其民族優越感或文化優越論之偏見，重溫中國隋唐時代之對外文化政策，則其對世界文化之貢獻，豈淺鮮哉？毋如談文化合作者，以征服之姿態，持同化之觀念，作支配之目的，而非以平等相待，鑿柄不容，安得治絲而不愈棼也？吾為此言，正仰慕歷史上各文化大體系，更敬重各國文化之特點。此種精神，原為中國之寶貴傳統，中國所以為愛好和平之民族者，即在平是焉。

是書編撰要旨，在說明隋唐間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上之關係，尤其注重文化之互相交流，互相影響之關係。中國與西方之文化溝通，起於地理上互相認識，政治上、軍事上、外交上之關係，與交通往來，從而發生文化之接觸。在中西文化接觸之後，於是學藝、技術、思想、與文物，隨而互相傳播，繼之以摹仿者也。當時中國對西方文化之態度，既無排斥之意，且感濃厚之興趣，加以北魏、北周、隋、唐等代之採納西方技藝者多，喜新好奇，競為風氣，故西方文化傳入後，即以平等相待，引為己用。初時一

技一藝之傳進，每作有意無意之摹仿，及積之既久，歷六七百年期間，傳入者愈多，文化體系之基礎益厚，故蔚爲大唐文化之全盛時期。中國如是，西方各國其所澤被於中國或其他各國文化之貢獻者，結果亦復相類也。夫國際上文化之交流，互相貢獻，誠爲人類最寶貴與最高尚之美德。文化交通史之研究，雖片斷史料，一鱗一爪，但爲先民流漬無限血汗之遺產，既不能湮沒而無傳，亦不以漫漶而見棄。茲綴爲大綱，無非椎輪；粗成梗概，僅供考據之資而已。



第二章 西方對中國之認識及六朝間交通往來

第一節 西方學者對中國之認識

由古代至中世紀之際，東西學者所得地理交通之智識，因接觸機會稀少，真情每多隔膜。由中國通西方之一途，中國學者所著於史籍之地理上零碎消息，僅限於西域、印度、波斯、阿拉伯，而以大秦爲最遠。要言之，中國人對西方交通之智識，最遠達地中海之東岸，即東經三十六度左右，依然未能察悉三十二度以西之區域。而由西方通中國之一途，希臘最古歷史家赫魯都吐斯（Herodotus，約生於紀元前四八四年），其著作中仍未知有中國。（註一）稍後學者，雖能詳悉印度，其涉及中國者，似亦僅得一名詞而已。西方人對中國稱呼之來由，約可分爲兩種：

（一）由「絲」之一字所傳譯，故希臘人每稱中國人或中亞細亞以東之人爲 *Seres* 或 *Serica*，羅馬學者，亦襲用此詞。（註二）

（二）或爲「秦」之一字所譯音者，愛利脫利亞海周航紀（*The Periplus of Erythraean Sea*）稱爲 *This* 或 *Thin*，多祿買（*Ptolemy*）稱爲 *Sinae*，哥斯馬斯（*Cosmas*）稱爲 *Tziniza* 或 *Tzinista*，敘利亞語稱爲 *Tzinisthan*，印度人稱爲 *Cinas*（脂那），梵文稱爲 *Chinas* *thana*（震旦或真丹），波斯語稱爲 *Chinisthan*，大抵皆爲「秦」字之對音也。

至於對中國情況之報導，西方學者，似多藉大陸上商旅所傳聞之資料，故其所記載者，僅屬隱約揣測之詞，中國之真相，仍未明也。愛利脫利亞海周航紀一書關於中國之記載，謂：

「經最北之區域後，大海之外止於大陸，名曰中國（*This*）其大陸上之內地城市，稱爲 *Thinæ*

(或長安)。Thinae 城之生絲，絲線及絲織品，由步行之商隊，運經大夏 (Bactria) 而至拔闐國 (Barygaza)，並沿恆河水道出口，以抵沙馬里加 (Samarica，即南天竺)。惟中國大陸，不易到達，故往來者鮮焉」。(註三)

是書約在紀元八十至八十九年間所撰，第一世紀西方人士對於中國之消息，由此可窺一斑。同時，希臘著名地理著作家斯特累波 (Strabo)，於其所著之地理一書，對印度會詳為記載，而獨闕中國。所稱之 Cathair，謂其人種清秀，似指中國而言。但所謂 Cathair 云者，乃介於海達斯披斯 (Hydaspes) 與亞士仙尼斯 (Acesines) 兩河之間，而仍在中國以外也。(註四) 普林尼 (Pliny，紀元一三三至七九年) 所言之 Seres，或為中國人，(註五) 但關於此種人之生活，亦未詳述。羅馬喀羅狄 (Claudius) 朝地理作家美拉 (Pomponius Mela)，著有地球之位置 (De Situ Orbis) 一書，謂：「亞洲之最東為印度人，中國人 (Seres)，及西徐亞人 (Scythians)，印度人與西徐亞人各居兩末端，中國人則在其中。」是書敘述裏海之西徐亞海岸時，曾說及中國人，謂：

「由此，其(海邊)之道路，繞一灣曲，轉而向東之海岸線。在毗連西徐亞海岬之一部份，首一部因積雪不能通過，其次並有一尚未開闢之荒土，由野蠻人所佔據。此種野蠻部落，為食人之西徐亞人 (Cannibal Scythians) 及薩加人 (Sagae)，被另一地區所隔斷，此一地區因野獸甚多，故無人煙。又有一廣袤之原野，亦為野獸麋聚，隨而可抵一稱泰必斯 (Thabis) 之山嶺，拔立於是區。由此行經一長程，又有金牛 (Taurus) 嶺巍然在望焉。中國人來自此兩區之間；此族以正直著稱，善於經商，彼等歸去時，尚許與他人處理其貿易，而留下貨物於一沙漠之地點」。(註六)

及紀元第二世紀，又有一著名地理學家多祿買 (Ptolemy，約紀元一三零年間)，關於遠東各國之

情形，著述似較爲熟悉。其所言中國（Sinai），乃北界於 Serike 之一部份，而在某大陸之東及南部，並在恆河以東。（註七）多祿買之記載，對於中國情形，實在尙未明瞭。第四世紀時，名史家馬錫林奴斯（Ammianus Marcellinus）所撰之歷史（The History of Ammianus Marcellinus，約在紀元三八零年），敘述中國人之生活情形較詳，茲引譯如下：

「越西徐亞之地區，向東行，一蜿蜒而綿延高聳之山嶺，屏障環繞，防衛中國人（Seres），使安居於豐腴而廣漠之平原。西面，彼出而與西徐亞人相接觸；北面與東面，由積雪荒涼之地帶所圍限；南面可遠屆印度與恆河。此等山嶺，吾人常稱之爲安尼維（Anniwa），拿沙威金（Nazaviciun），阿斯米拉（Asmira），伊莫丹（Emodon），及奧波魯加拉（Opurocarra）。其平原之四週，由峻峭之懸崖所圍繞，橫貫以兩條著名之河流，一曰阿察地斯（Aechardes），一曰波德斯（bautis），蜿蜒如帶，迂緩流行。中國人享受其寧謐之聚居，免於戰爭之禍。由於裹抱沉着與和平之氣質，故其最愉快者乃爲一種恬靜之生活，敦睦四鄰，並無糾紛。彼有迷人之氣候，及令人康健之空氣；天空晴朗無雲，薰風淡蕩，森林蔥鬱，掩蔽陽光。

「森林中之樹木，供應一種當時所稱爲似羊毛之產品，常以水浸之，然後梳出精細而柔軟之絲線，一半屬羊毛性纖維，半屬膠質之細縷。此種纖維，紡績而製成絲焉。此絲之用途，曾祇限於吾人貴族之享受，現已流行於各界，即使最低之階級亦然。中國人在習慣上較其他人爲樸儉，力謀度和平之生活，遠避與其他民族之交際。因此，當外國人在其邊界渡河，購買其絲或其他貨物時，交易祇相對以目而決定，並無一言。彼等資財如此豐裕，雖準備銷售其自己之產品，但並無購取外貨之意也」。（註八）